

观察家

国强民富公平公正两个目标何以兼得

□杨英杰

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考察时指出:“我们目前有两个目标。一是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从这席话看,第一是要有成果,第二是全体人民共享。这两个目标紧密联系,没有成果,谈不上共享;没有共享,成果不会保持长久。

实现这两个目标,首先要求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市场取向的改革。

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只有蛋糕做大,才可以更好地分配蛋糕,有实力更好地致力于收入分配。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不应质疑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其市场进入的自由和市场竞争的充分。我国改革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出现都与“进入的自由”和“竞争的充分”没有更好地实现有关。而这一点,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否彻底。

当前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是必须改变政府在经济领域仍然过多地直接配置资源,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的现状,这一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体制障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已不容我们久攻不下。

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更应对有可能阻碍改革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努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保持警惕。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比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世界银行决定帮助

各国政府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在各种制度中,缺少一个担保登记制度。所谓担保登记是指,借款人为贷款提供资产担保需被正式登记在案,这样潜在的贷款提供者就能够对借款人已经抵押的物品保持警觉,防止重复担保的发生。实行这一制度,不仅有利于银行防范金融风险,也有利于一些中小型企业自觉地、更好地根据其资产进行融资。

然而,在讨论这样一项明显有益的制度时,世界银行却遭到了现有银行的强烈抵制。为什么?因为现有银行有能力在不存在担保登记制度的情况下获取相关信息,并不是说这些银行不能从这一制度中获益,而是它们不愿意看到其地位受到因这项制度的建立而能够增强其竞争力的其它贷款者的挑战。现有银行因惧怕竞争而否决了这一计划,这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力量。

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在社会中的存

在,但绝不允许不讲公平公正,无限做大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那些涉及多部门、触动深层利益格局的关键性改革,应当加强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和高层次协调,运用超脱部门利益的法律手段推动改革方案的实施,避免部门扯皮和久拖不决。

市场既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也是基础性的收入分配机制。贫富差距拉大不是市场的错,也并不代表社会不公正程度的加深。从世界范围来看,以基尼系数为代表的收入分配差异指标在一些国家或许并不高,然而民众对收入不平等的相关关注和感受却异常强烈,甚至引发社会的动荡;而一些基尼系数相对较高的国家却并未出现社会的不稳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

如果市场是公正的(或者说市场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而且竞争比较充分),如果每个人都

能在平等条件下获得成功(或者说个人的发展机会是平等的,从比较贫穷的阶层得到提升的机会是平等的),那么,基尼系数的高低或许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此,只要起点公平(如受教育的机会、健康的机会、迁移的机会等)和过程公平(如发展机会、市场进入机会、阶层提升机会等)得到较好的实现,政府同时注意补救市场失灵引起的社会代价,统筹好发展成果的再分配,不断改进公共服务,相信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者能够分享不断增进的社会财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然能够实现。

实现这两个目标,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以个体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安全网。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并不仅仅在于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以提升国内需求,更重要的是增强公众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在经济处于周期的低谷时,

使公众具有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职业培训的机会和医疗救助的机会,从而使那些失去工作机会的民众看到重返市场的希望。这也是从二十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得出的教训。在美国大萧条之前,西欧国家只有20%的劳动力有某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只有22%的劳动力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几乎没有听说过。结果是,大萧条引发的巨大失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催生了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还不完善,以家庭保障为主的保障方式,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所引发的人口迁移而受到极大的挑战。以养老保险为例,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是迫在眉睫。



■人物志·杨英杰

经济学博士,中央党校副教授,财经杂文作者,本报特约供稿人。

来自日内瓦

理财往往起于一念

□徐千惠

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似乎难以改变。尽管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不断上调利率(15次利率上调),但美国的活期存款账户利率却没有丝毫上升。根据美国对存款账户收益率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均存款利率在过去6个月中仅仅增长了4个基点为0.59%,而活期存款账户并未沾到什么光,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一般来说,存贷款机构给出的储蓄利率平均要比银行活期存款账户的利率高出23个基点。同时,我们也知道联邦基金利率(美国的)存款利率也有着间接而实质的影响。当美联储的利率调整使联邦基金利率从2004年6月的1%上升到目前的4.75%水平时,一些金融机构为了吸引存款,相应地提高了高收益存款账户和定期存款账户利率,然而活期存款账户的利率变化(低于0.6%水平)并不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由于活期存款账户内的资金流动性高和使用十分方便,人们习惯于开一个这样的存款账户放置支付账单后余下的钱,却很少考虑这类账户的回报率非常低这个问题。这可能是消费者的一种习惯性储蓄倾向,即也不习惯于将他们活期存款账户中余下的钱不定期地转移到高收益存款或者其他理财账户中去,当然这样做会花费消费者的一些闲暇时间。因而,尽管活期存款回报率非常低,但仍旧有许多人还是将钱存在那里。

笔者比较了全球十大金融城市内10家最大银行及一些信贷金融机构提供的存款利率情况,全美国至少有超过12家金融机构的高收益帐户所提供的利率(回报率)高于4.5%。其中,大多数账户的开户资金从1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如果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会发现,如果你在活期存款账户内存入2000美元,那么你在年底就可获取90美元的利息收入,如果将同样的钱存入活期存款账户,你只能以0.59%的活期存款利率获取11.80美元的利息收入。

这样的比较发现,如果你稍微费点神,在金融机构开设一个高收益存款或者其他理财账户,就可避免活期存款账户的低利率降低你的收益率,而不是为了图方便在活期存款账户中继续存钱。当然,这一切都得由消费者自己拿主意了。

由美国的案例引伸到中国,其实情况也是大同小异的。例如,一些国内银行推出了年收益率3%以上或累计收益率10%以上的理财产品,这类理财账户的年收益率肯定要高于活期存款账户的年收益率。

如此比较发现,活期存款账户的收益率如此之低,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勤快些选择高收益的存款或理财账户呢?

多声道

全国城乡规划中存在5大问题

姚兵(建设部纪检组组长)

全国城乡规划中存在5个主要问题:1、城乡规划的指导思想存在偏差。一些地方领导在城市规划上,重地上,轻地下,热衷于建大马路、大广场,大搞人造景观、假古董,造成很大破坏和浪费;2、城乡规划调控职能削弱。一些地方将市一级规划管理权限下放到区县,有的政出多门、多头审批,开发区实行封闭运作,不接受当地规划部门的统一管理;3、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地方的领导和行政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开发商领导,市长决策,规划局执行”的现象在很多地方存在,严重破坏了城乡规划及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4、规划监管机制不完善。尚未建立起规划行政层级监督制度,各级规划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机联系;5、村镇规划水平不高、机构不健全。

用新农村建设带动内需和消费

林毅夫(北京大学教授)

2006年我们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或者是产能过剩压力,可能比2003年到2005年的情形更

严重,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招活棋,如果这一步走好,可以带动内需,扩大国内市场,走出通货紧缩,而且,具有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等一石数鸟之效。今年,要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可以解决当前的这种市场需求相对比较高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好处。

看好新的能源技术

纳伊米(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

在全球能源需求日益上升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能源技术,并相信能源行业能够克服目前所面临的技术挑战,满足全球对石油产品日益上升的需求。历史已经证明,石油行业能成功地驾驭技术的力量。

加息是央行打的一个触线球

科斯特洛(澳大利亚财长)

澳大利亚通货膨胀率仍位于2%-3%的目标区间内。此前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拆拆利率从5.50%上调至5.75%。央行目前关注的是今后澳大利亚通货膨胀可能引发的忧虑,此次加息决定是央行根据全球经济环境作出的。这是央行打的一个“触线球”。(雨人摘编)

多棱镜

金融业反洗钱是一个系统性难题

□邓聿文

洗钱将给我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随着反洗钱法草案日前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社会对这一草案的关注也多了起来。

所谓“洗钱”是指不法分子通过金融或其他机构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财产”的过程。由于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的反洗钱工作刚开始不久,反洗钱的难度还相当大。

具体来说,金融业反洗钱的难点,首先表现在金融环境还不够规范及金融秩序尚待完善上。为了争夺储户和存款,很多银行在不同程度上都通过放宽开户条件、直接或间接提高利率、放松管理制度等各种手段吸引客户、扩大业务、吸收存款。在这样的状况下,尤其是在金融秩序混乱的地方,很难有效地预防和查处洗钱活动。

部分金融机构经营者对反洗钱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这是造成目前反洗钱工作困难的原因之一。有些金融机构的管理者认为反洗钱是发达国

家的专利,中国没有必要跟风,否则会造成失去大量客户的风险。因此,有些经营者在实际工作中对反洗钱工作反应麻木。

反洗钱的另一个难点是金融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强和存在道德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和网点猛增,使得各金融机构无法严把从业人员资格的关口。他们当中有些人教育程度不高,虽然自己可以做到不违法、不犯罪,但由于没有过硬的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即在面对可疑的金融交易或者明显与洗钱有关的交易,也难以进行辨别。另外,一些地方金融系统的领导只重业务发展和经济效益,轻职工道德建设和操守教育。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有章不循、有制不遵、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结果是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实施洗钱等金融犯罪轻而易举,根本无法有效防范和查处洗钱。

事实上,反洗钱工作关系到经济运行的安全和国家声誉。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是资



■本期人物话语

央行高度警惕房地产泡沫的负面影响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房地产金融的健康稳定对金融系统的健康稳定至关重要。房地产泡沫对经济金融与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泡沫破灭后的负面影响,令各经济体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警惕,密切关注。

在逃避司法查处风险上却要小得多。因此,非法的民间借贷组织已经成为重要的洗钱渠道。

最后,反洗钱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有些规定的操作性不强,也增加了防范和打击洗钱的难度。从我国打击经济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对金融诈骗、侵占、骗税、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的侦办,目前仍处于一种较为被动、滞后的状态。经侦部门经手的大案要案大都是由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发现问题后反映出来的,而由金融机构主动发现线索或在案犯作案过程中予以查获的寥寥无几。同时,大量案件的事后调查表明,巨款都是通过各种金融机构,在不受任何监控的情况下被转移到境外的。

有鉴于此,我国应尽快制定出台与反洗钱相关的法律程序,特别要注重制定与反洗钱法律相配套的一系列金融法规与实施细则,强化反洗钱工作的协调机制,加强金融系统人员的素质和道德教育。

第三只眼睛

启动消费 还须建立长效机制

□李长安

“五一”黄金周刚刚过去,各个商家都在盘点自己的盈利,而政府部门也在统计一周来的社会消费总额。从往年的情况来看,“黄金周”在刺激社会消费方面还是成效比较显著的。不过,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来看,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依然是困扰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障碍。因此,从增强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提高国民经济的消费水平这个角度出发,启动消费还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一般来说,“黄金周”所形成的消费高潮在整个消费曲线当中只能算是一个短时间的消费“冲击”,它的特点是短期性、集中性和消费结构的片面性;而整个社会消费水平的持久提高,却有赖于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和消费预期的持续向好。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恰恰是在影响消费的这几项关键因素上,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首先,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比,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相对比较缓慢,而收入是影响消费的第一要素。从统计数字来看,近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一直保持了近10%的高速增长势头,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却始终落后于经济增长的步伐。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5年我国的GDP增长了9.9%,与此同时,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比上年增长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增长了9.6%。两者分别比GDP的增长率要低3.7和0.3个百分点。

其次,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成为导致消费不足的另一诱因。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最要体现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日渐扩大这个事实。根据有关统计,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3:1,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等隐形收入,那么差距可能扩大到6:1。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收入差距的问题也体现在“黄金周”的消费方面。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5年,我国国内旅游者人数达到12.1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5286亿元,人均消费436元。但是,旅游的主体主要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虽然在旅游人次上要超过城镇居民,但在旅游消费能力方面却大大落后于城镇居民。2005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3656.13亿元,人均是737.1元;而农村居民总花费只有1629.73亿元,人均227.6元。城镇居民的消费总额比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额要高近2倍,而人均消费则要超过3.2倍还要多。此外,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当人均收入达到300美元时,

会产生近距离旅游;超过500美元会产生区域旅游;达到800美元会产生远距离旅游。而我国农村居民2005年的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约合400美元),这就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出行范围和消费能力。

最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压抑了居民的消费预期。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处在剧烈的变革之中,经济体制的转换使得传统的社会保障体制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而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又尚未完全建立。对于那些处在社会保障这把“安全伞”边缘的众多居民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们节俭消费,削减当前消费。而医疗费用、教育费用和住房价格的飞涨,更使消费者捂紧自己的钱包。在投资渠道狭窄和规避风险的情况下,银行存款或者购买国债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据央行的统计,截至去年年底,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14万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另一组经济数据却在连年下降: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接近20个百分点。越来越富的中国人却越来越不敢花钱,社会保障的缺陷可以解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除此以外,自1999年开始实行的“黄金周”制度到现在,还出现了一定的“假日疲劳”症,这集中表现在居民“黄金周”旅游出行的意愿下降,旅游消费增长率徘徊不前等。比如2005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99.2亿元,而6月份是4935.0亿元,有“黄金周”的5月份消费总额竟然比没有“黄金周”的6月份还要低。再从增长速度来看,6月份增长率也要比5月份高出0.1个百分点。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黄金周”虽然带来了短时间的消费冲击,但从启动消费的角度来说,光靠几个“黄金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建立启动消费的长效机制,是一项紧迫且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其一,要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放到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使绝大多数的国民能够享受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利益;其二,切实解决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把提高农民收入当作中心任务来抓,完善城市反哺农村的渠道和机制;其三,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的消费预期。特别是在关系民生的医疗、教育等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努力消除居民对未来不稳定的消费预期。